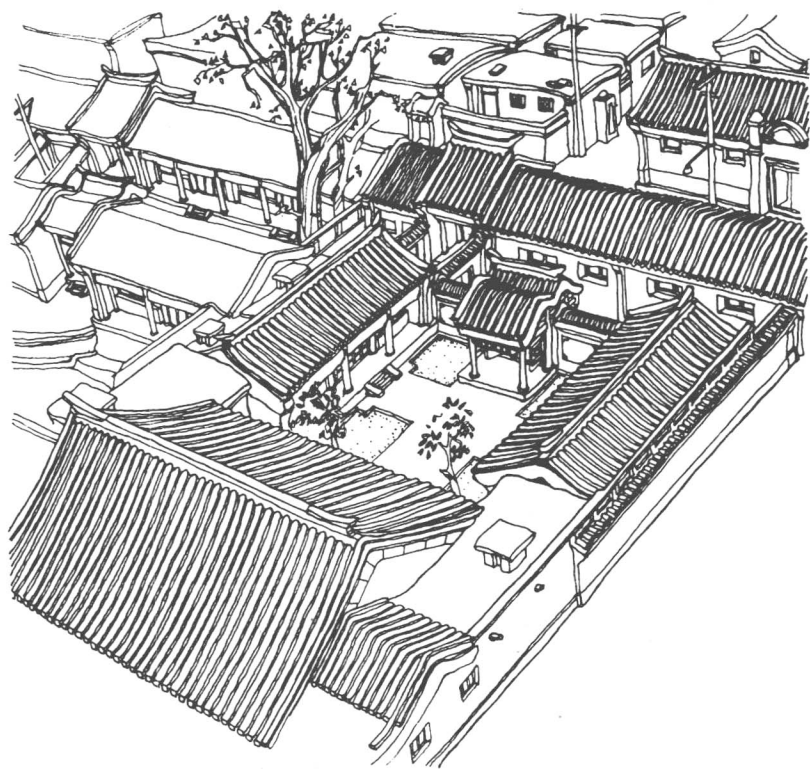


北京四合院

BEIJING COURTYARD

柳色黄金暖，
梨花白雪香。
玉楼开翠翡，
珠殿入鸳鸯。

(李白)



引 言

民居是建筑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首先，民居是人类建筑的起源。考察一切建筑的发生、发展，都可以找到与人类早期居住形式的关联。这里所谓的关联是以复线形式展开的，即：狭义上的，居住—庙宇—其它建筑的演化程式；广义上的，居住—聚落—城市的演化程式。

其次，民居为建筑的主体。在所有建筑类型中，它占有绝对的多数。量上的优势使得民居能够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人类群体的习俗与观念。

由于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因而中国民居形态各异，其中影响范围最广的民居形式应属四合式居住体系。而黄河中上游的窑洞、云贵高原的干阑式建筑、蒙古草原上的包帐以及东北原始森林中的井干式房屋等，均属于地域性住宅，不足以说明中国民居的整体。北京四合院是中国四合式居住体系中最为规范化的代表，因此对于它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

作为传统的住宅，北京四合院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至今它依然是北京旧城内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之一。北京四合院建筑风格质朴，院落布局有序，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学研究价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北京四合院蒙受到严重的损失。目前北京四合院的状况已经成为全社会关心的课题：诸如北京四合院的状况关系到北京人居住环境的质量，对于北京四合院的保护实质上是对北京地方文化的保护等等，有关措施正在按照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方针分步实施。另一方面，理论工作显得滞后。纵览中国建筑史书籍，涉及北京四合院的专著甚少。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着手这项工作的的时候了，否则将使我国的北京四合院研究出现无法弥补的断层。

以往国内对于民居的研究，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居住的本体。事实上居住不仅仅是人们防风避雨的栖息场所，也不单单是建筑空间的围合，它还应是传统的延续，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整合。在此，我们把北京四合院置于全方位的角度，运用多种学科加以综合地研究（图 0-1）。

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

地理环境是制约人类居住形态的重要因素，这种制约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发展阶段尤为明显。不同地域之间的居住是有差异的，导致差异的原因既表现在自然地理上，也表现在文化地理上。于此，本文从宏观比较不同地域四合式居住异同入手，力图找出中国四合式居住各体系之间的关系与本质性的规律，以便在较深的层次上理解北京四合院的形态构成。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居住是一种有形的文化，在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与家庭结构、民间习俗、宗教、艺术等文化现象。北京四合院亦复如此。本质上，北京四合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其核心内涵为儒家的礼，同时还与世俗化的宗教及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居住的意义是我们注意的重点。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

住宅社会学所关心的是居住对居民的社会生活、行为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正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指出的那样：“起初是我们塑造房屋，而随后是房屋塑造了我们。”就北京四合院而言，过去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至于今天它仍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当然，结论是以调查和统计作为依据的。

从比较学的角度研究

运用比较学的方法，一般是将研究的主体与其它相关要素并置，然后探其相同相悖，进而得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本文除了将不同类型的四合式居住进行比较之外，还考察了北京四合院与城市的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形态上，北京是四合院化的城市，城市的宫殿、庙宇、官署等均采用四合院式的布局；意义上，城市与四合院认同的本源为中国传统哲学观念。

北京四合院毕竟属于建筑学科的范畴。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广泛涉及到城市学、园林学、建筑学等方面的内容。

为了使研究工作更加系统化、条理化，本文还建立了居住研究模式。我们认为，居住研究是一种诠释过程。对于北京四合院的诠释具有双重涵义：

其一，是对北京四合院自身的诠释，包括住宅的空间、形式、营造、结构等；

其二，是对北京四合院意义的诠释，包括住宅的起因、文化内涵、与周边地域居住形态的关系、对居民的影响等。前者是表层的，后者是潜层的，两者之间相互依赖，彼此不能孤立。

基于简约的方式，我们把讨论所涉及的内容用五种元素加以概括，由此建立总体研究模式，即：研究的本体 (Dwelling)，时空 (Time and Space)，自然环境 (Natural Environment)，社会环境 (Social Environment) 和人工环境 (Artificial Environment) 模式，并将这种研究模式渗透到全文的各章节之中 (图 0-2)。

应该指出：该模式具备整体性、转化性、自调性，其中模式的任何一种元素的变化，都可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从而也带来新的诠释内涵。

最后，让我们简要浏览国内外有关北京四合院的著作。

较早介绍北京四合院的书籍也许要算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油印本) 和刘敦桢的《中国住宅概说》。上述著作除了概述北京四合院型制以外，都提到了北京四合院是中国北方住宅的代表，并认为该种住宅的布局受到了中国封建宗法礼教的影响。关于北京四合院的专著，国内还不多，50年代末王其明、王绍周合著的《北京四合院住宅》侧重对居住的型制、设计及施工方法的总结；80年代末邓云乡的《北京四合院》主要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住宅进行考察。国际上对北京四合院的研究起步于本世纪初，就研究人员构成来说主要限于日本学者，著作包括《北京南郊的民家》、《北支蒙疆的住居》等。70年代以后，对北京四合院研究的国家有所扩大，其中瑞士专家文纳·布莱斯 (Werner Blaser) 所写的《中国四合院》，将北京四合院与苏州四合院进行了比较。此外，欧美诸国及香港、台湾地区也有大量介绍北京四合院的文章，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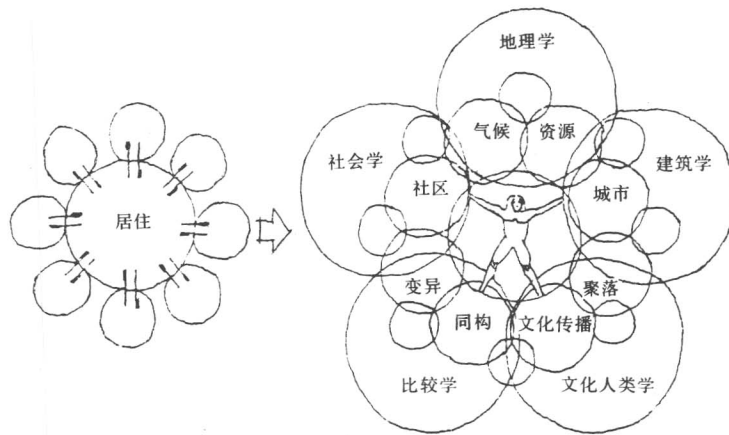


图 0-1 居住的多方位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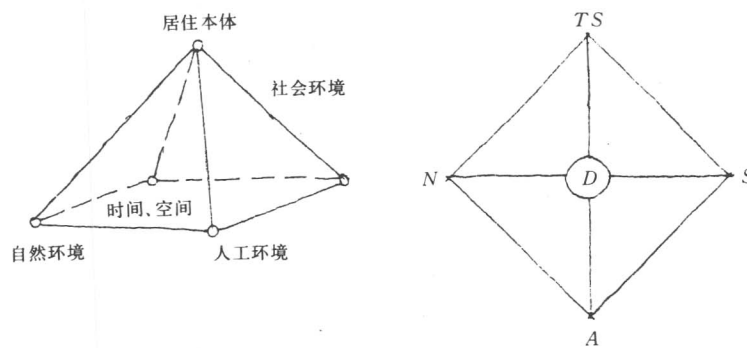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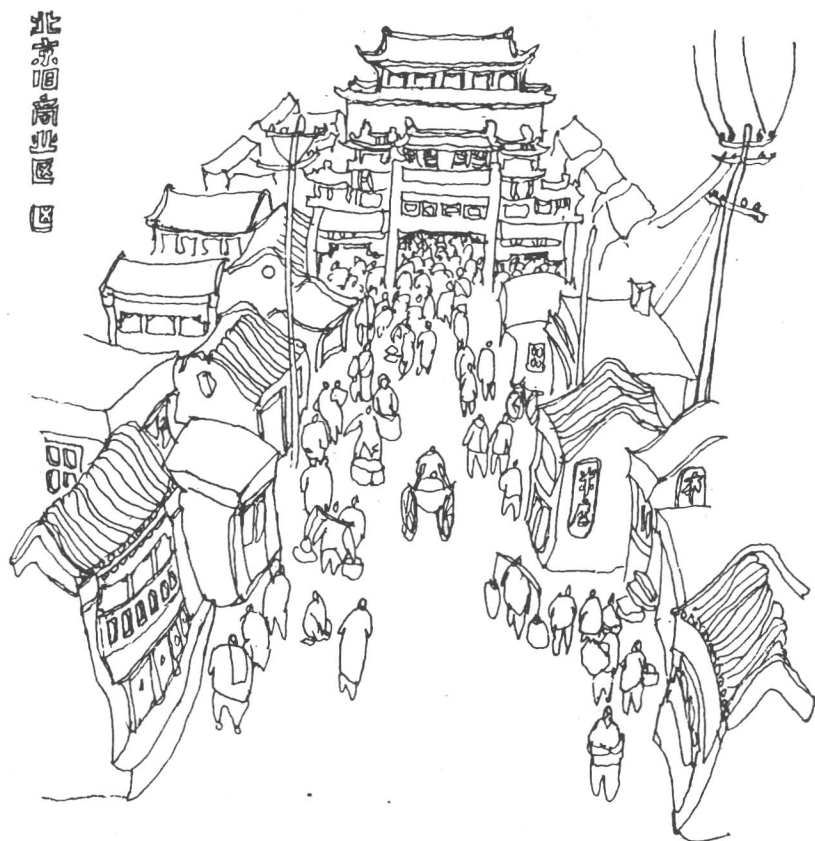


图 0-2 居住研究模式

都城水绿嬉游处，
仙棹往来人笑语。
红随远浪泛桃花，
雪散千堤飞柳絮。

(贾昌朝)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北京四合院的历史成因及其演进

一、元代北京四合院是两宋传统民居形式的延续

目前，我们能够考证到的北京四合院最早只能追溯到北京安定门附近的后英房元代遗址。通常建筑界也把它视为元代北京四合院的典型。从事物发展规律上看，一种规范化的型制，自诞生到成熟需要漫长的演化过程。那么，元代北京四合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不妨先做一番历史的回顾。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表明，汉文化具有巨大的亲合力。其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周边区域的文化较为落后；外族的进入，军事上或许能取胜于一时，文化上则往往导致其自身某种程度上的衰微。北魏、辽金时期以及稍后的元代无一不是如此。

就社会结构而言，元代的汉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建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集权机构；放弃游牧经济，代之以农业为本的新经济政策；提倡宋代的程朱理学；启用大批汉人理政。如此这般，使得元朝在短短几十年内构筑起一个与中原文化相适应的封建大国。

与此同时，元代的居住方式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首先，实现了由“帐殿制”到“两京制”的转变。

“帐殿制”是指蒙古早期的都城没有固定地点，部落之间商议军政大事临时择地。据有关文献记载，此制度一直延续到金朝灭亡^①。忽必烈继任汗位以后力改旧制，把蒙古的政治、军事中心分别定在开平、燕京，即所谓元代历史上的“两京制”。本质上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东西二都

制”^②的翻版。

其次，实现了由迁居到定居的转变。

蒙古由于地处草原，长期以来那里的人们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进入华北、中原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他们不得不放弃游牧栖身的蒙古包而采用汉民的居住方式——定居。定居出现于元朝建立以前，实现全面定居具有渐进性^③，元大都“里坊——四合院”体系标志着迁居到定居转变过程的终结（图 1-1）。

综上所述，元初社会制度与居住方式的汉化，是北京四合院形成的历史契机。

论及元代北京四合院是两宋传统民居形式的延续这一命题，是有充分的史学依据的。现将北京后英房元代遗址与宋代《千里江山图卷》中的住宅加以比较（图 1-2、图 1-3）：

	后英房遗址	宋画中的住宅
院落布局	前后院加两跨院的布局方式，纵向院落有明显的轴线对称关系	住宅多为前后院制，纵向院落一般有明显的对称关系
堂室关系	堂前室后，中间用穿廊相连，堂、廊、室呈工字形布局	厅堂与寝室位于住宅的中轴线上且多数呈工字形布局
厢房位置	东西厢房制，厢房位于西院堂堂室和主院北房两侧	厢房多位于前院或堂室的两侧
其它方面	主院北房采用前出轩、两侧立夹屋 ^④ 的做法	较大的住宅厅堂前出抱厦、两侧附带耳房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北京后英房元代遗址在建筑总体布局上与宋代民宅一致，它们之间仅仅存在着细小的差别。

进一步分析,《千里江山图卷》所勾勒的宋代住宅并非孤立,特别是后英房遗址中所出现的工字形布局方式,在宋代相当普遍,其特点从北宋的《清明上河图》、《文姬归汉图》以及南宋的《江山秋色图卷》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图1-4)。

又则,经有关专家考证,北京后英房、西桃园等几处元代住宅遗址所采用的建筑技术,基本上沿用了两宋的传统,一些细部做法甚至与宋《营造法式》完全吻合^⑥,这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元代北京四合院源于宋代传统住宅。

二、明清北京四合院的演进

明清北京四合院在型制上与元代北京四合院相比,产生了两点重大变异,这就是院落布局的变化和工字形平面的消失。经考证我们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元代北京后英房等遗址中的前院面积远远大于后院,而明清北京四合院相反,前院呈扁长形(图1-5)。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在于明清北京城市人口的增长。据《顺天府志》记载:明初洪武二年,北京地区在户人口4.8万余人;到了洪武八年,人口已达32.3万余人。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京师人口再次迅速增长。入清以后,北京城市人口仍居高不下,据清末1908年人口统计,北京实际人口已超过100万。从宏观上说,住宅每户占地面积与城市人口增长呈反比。元初大都每户四合院面积规定为8亩,到了明清时期,一般大的宅子占地4亩,小的占地1亩,甚至占地半亩的宅子亦不在少数。上述状况我们从西西北一带四合院的变迁即可窥视一二(图1-6)。

第二,明清北京四合院取消了前堂、穿廊、后寝连成的工字形布局,代之以东西厢房、正房、抄手廊和垂花门组成的名副其实的四合院格局。型制变化的原因有二:一是明洪武到永乐年间,政府为巩固边防实行屯田,大批山西移民迁入京畿。如据北京市大兴县地名办公室调查,目前全境526个自然村中,有110个村庄是由山西直接迁移的。按照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人口的迁移意味着文化的扩散。经考证,山西襄汾一带的明代民居与明清北京四合院酷似,这至少说明了两地的居住在型制上有着某种潜在的渊源(图1-7,1-

8)。二是明清北京四合院的变化与明代以来工字形平面在各类建筑中逐渐消失有关。纵观中国建筑发展历程,宋元时期工字形平面不仅民居中采用,而且宫殿、寺庙、官署亦多采用。但明代以后,这种布局方式在各类建筑中较为罕见。此外,还有人认为:明清北京四合院的许多细部做法受南方的影响。

三、近代北京四合院的状况

1840年起,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从而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同时,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史称“西学东渐”。

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居住方面。清末民初在北京部分王府贵宅中兴起了一股西化的潮流。应当指出,追求西化的动机因人而异,有的是为标榜新派在宅内建洋房,有的是审美趣味的改变,更多的是把西式建筑当成玩意,当然还有的是外国人购宅后加以改建。在此仅举几例:

荣禄故宅

位于东城区菊儿胡同。荣禄是清末官僚,其宅西部为洋式楼房,中部为花园,东部是五进院的传统四合院住宅。

后圆恩寺7号四合院

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它是一座中西合璧式宅院,中部为一西洋式楼房,楼前有一个带喷泉的圆形水池,池南是一座花岗石的西式圆亭。此宅据说是某贵族为取名妓欢心所盖。

麻线胡同3号大宅院

位于东城区麻线胡同。民国初年梁敦彦买得此宅后,将宅改为中西式建筑,宅中有一大圆厅,顶部呈尖顶圆形,供唱戏、跳舞用。

淳亲王府

位于东交民巷正义路西侧。原为淳亲王府,1860年沦为英国使馆,东部原有建筑已不存在,添建一座仿中式建筑的楼房,但楼房的门窗为西洋式,西部有改建的四合院

住宅一所和后添加的英式楼房。

事实上中西式的四合院绝不仅止上述几例，诸如清末民初北京城内住宅中西式大门（俗称圆明园式宅门）的时兴，日伪时期不少住宅被改建为办公用房及官邸，某些房内铺设榻榻密等都是。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使上层社会中的四合院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如在院内安装卫生设备、电灯、自来水、暖气等。但总的来说，该时期北京四合院基本保持了明清型制，西化的趋势并未扩大，这与近代北京并未沦为象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等那样的殖民地城市不无关系（图 1-9、图 1-10）。

四、当代北京四合院

对当代北京四合院的考察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 1949 年到 1966 年，其特点是北京四合院住宅向着多用途的方向发展。

由于社会性质的改变，昔日王府大院不再仅被少数贵族占有，而供机关、工厂、学校、幼儿园、俱乐部、医院等使用。这种住宅多用的方式有利有弊。

第二个时期从 1966 年至今，其特点是破坏与保护兼而有之。

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京开展了一场全民深挖洞的运动，大大小小的防空洞破坏了四合院的排水系统，其后果极为严重。

1976 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尽管北京倒塌的房屋不多，但震后城内四合院普遍设置抗震棚，多数临时性建筑至今依旧保留。此外，随着北京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在四合院中加建、改建房屋的现象屡有发生。诸如此类，导致北京四合院面貌全非（图 1-11）。

1983 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四合院的保护方针，使恶化的趋势有所控制。近几年来，北京又兴建了一些老式四合院和新式的类四合院，用于饭店、旅馆及旧城内的居民住宅（图 1-12、图 1-13）。1990 年北京市政府又决定投入大量财力对旧城危房区进行改造，相信不远的未来，北京四合院的状况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第二节 北京四合院形成的自然条件

一、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尽端，西北部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东南部是洪积冲积扇形地和冲积物组成的一片平川，依山面海，形势优越（图 1-14）。

北京的河流均属海河水系，主要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洹河五条大河。北京地下水源丰富，民国以前居民多饮用井水，清末宫廷饮水用车从玉泉山附近拉来。

北京的地质属黄土冲积层，主要由永定河挟带的泥沙冲积而成。城内因历代多次营建，碎砖回填土较厚，建宅地基条件并不理想。

北京处于多震地带，从明清文献中可找到多次地震的记载，其中以康熙七年、十八年和雍正八年的 3 次为大，延时较长。住宅所采用的框架式木结构适应了地震区的防震要求，从而得以长期大量地保存下来。

北京的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多风，秋季短促。平原区年平均气温为 12°C ，绝对最高气温 42.6°C ，绝对最低气温 -22.8°C 。年平均降雨量 682.9mm，其中 70%~80%集中在夏季。风向以北风最多，冬季冰冻线在 -0.8m 。

气候是制约居住形态的因素之一。由于北京冬季寒冷，住宅墙体平均厚度达 490mm，屋面厚度达 200~300mm。为了适应夏季多雨、春季多风沙的特点，屋面采用两坡顶的形式，坡度约为 30° 左右，并出挑至台明外沿以便于排水。院落布局封闭，居住建筑朝外一面极少开窗。此外，院内各建筑之间的间距较大，有利于日照、采光。

二、自然资源

北京地区的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现将涉及建筑方面的资源分述如下：

（一）木材

北京的木材资源多集中在西北部山区。森林原始植被

主要是耐旱的落叶阔叶林，绝大部分是次生的。树种有松、榆、柏、柳、榛、枣、栗等。城内许多地名用树木命名，如槐树胡同、槐树大院、槐柏树街、松树胡同、柳荫街等。其中松树是建筑的主要用材。

（二）石灰

北京西部现门头沟附近盛产石灰，以甫营村、大灰厂最为著名。传说此处烧灰已有千年的历史，明清北京城用灰也由这里供应。据《房山县志》述：“羊圈头、后甫营、大灰厂，沿山皆产灰，有青白两种，青者出自然，白者本石质，必加火烧，而后性粘细，白者固砖，青者梁色。”

（三）矿物

煤是北京最主要的矿产之一，历史上北京就有“西城的牛马柴炭”之说。目前门头沟三家店一带仍出产原煤。另外，北京地区还有金、银、铜、铁、锡等矿产，而且开采年代甚远。据《顺天府志》记载：“银冶在城西北一百八十里颜老山，铁冶在城西北一百五十里清水村。”

（四）其它

竹、麻、芦苇、石材都是重要的建筑用材。在北京地区生产的竹类有甜竹、绿竹、苦竹；麻出产于顺天府所辖的宝坻县；芦苇产于北京周围的河湖，它既可用于屋面材料，又可编织草席；石材多产于西部山区，如房山的汉白玉曾用于建造明代的宫殿。

北京四合院的主要建筑用材是：砖、松木、杂木、石灰、麻、芦苇、石材等。但部分建材也需要从外地运来，如明代贵族皇室所用的铺地金砖、太湖石等均产于江浙地区。

第三节 与居住有关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多区域、多民族的人口构成

北京是我国北方多民族聚集地之一，自古以来人口迁移频繁。由于地理地势优越，早在夏、商、周时期，北京就成为华夏文化与戎胡文化交流的枢纽，中原与东北经济往来的汇合点。此后，随着东汉乌桓、鲜卑的迁入，北周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等，进一步强化了北京地区多元人

口构成的特征。

近代北京人口的组成，与元以来数次人口大迁移关系密切。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发生在元初，迁入来自三个方向，即北方的蒙古人，西方回族人 and 江南 30 万工匠。第二次人口大迁移发生在明代，迁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洪武、永乐年间朝廷下令从山西洪洞、临汾、襄汾一带移徙无地农民来京耕种，另一个是明初“轮班匠”制带来的南北雇工。人口迁出则主要发生在明末，有关文献记载：1636 年、1638 年、1642 年清军三次进入京畿，掳去大量人口。第三次人口大迁移发生在清初，清军入关后北京的内城实际变成了满族人居住的城市。

清末民初，生活在北京的居民主要由汉、满、回族组成。城市人口以汉族为主，满族次之，回族人口也高达十几万。由于各民族长期混居，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渐趋同一，居住方式已不存在本质性差别（图 1-15）。

二、社会经济生活

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是一座典型的消费性城市。京杭大运河的地利之便，给北京带来了商业的空前繁荣。元初大都的经济生活并不活跃，原因主要在于蒙古人尚未摆脱以畜牧为主的经济结构。稍后，军事征服完毕，社会秩序平稳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大都商品经济开始复苏。关于大都经济生活的状况，《马可波罗行记》中有所描述：“汗八里大城，居民殷繁，货物云集，每日进城，不下千车，……”当时大都城内专门市集有 30 多处，最繁华的地方在市中心鼓楼和西城羊角市一带。

明初，成祖迁都后北京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据永乐二十一年山东巡抚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⑥。”当时北京的商业除了有固定性的专业市场，如猪市、羊市、牛市、煤市、米市、灯市、花市外，还有定期庙会。

入清以后，一切沿袭明制，庙会集市则远远超过明代：“京师之市肆，有常集者，东大市西大市也；有期集者，逢三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

谓之四大庙市，皆以期集^⑦。”

诚然，元以来北京的都市商业十分繁荣，但这并不能掩盖其经济上的畸形。北京城市的消费远远大于生产，各种大规模的经营多掌握在外省商人手中，正所谓“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⑧。”此外，经济生活的繁荣给北京带来了一种新的建筑形式——廊房（图 1-16、1-17）。

三、宗教信仰

用计量史学的方法，从地名着手对考察北京居民的宗教信仰具有特殊意义。在《乾隆京城全图》上标名的寺庙有 1300 多个。最多的是关帝庙，共 87 个，如果加上以祀关帝为主的红庙、白庙、伏魔庙等合起来共有 115 个。其次是观音庙，有 81 个，加上白衣庵等共有 108 个。清时北京正阳门内左边为观音殿，右边为关帝庙，据此可以得出这两座神是北京居民的主要崇拜对象。其它较多的寺庙有：土地庙 42 个，真武庙 41 个，大神庙 39 个，娘娘庙 30 个，以及数目不等的龙王庙、玉皇庙、药王庙、财神庙、清真寺和天主教堂等等。

统计表明，北京居民所祀对象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明代中后期，北京庙宇兴建繁奢，分布迅速密集。到了清代，正统宗教益加衰微，北京民间宗教已趋于三教合一，因俗立祀，因行立祀，除了天主教堂和清真寺以外，其它寺庙之间区分并不十分明显。总之，北京民间宗教的特点是世俗化、行业化，人们并不关心儒、释、道派别之分，而注重从祀拜中获福保安，或者从中得到寄托。

四、庶民文化

庶民文化是一种基层文化，并受到上层文化和邻近民族文化的影响。它是居住研究的重要参照，其内涵主要包括饮食习惯、服装、语言文字、民间艺术、社会组织等。现将北京近代庶民文化的表征分述如下：

（一）饮食

1. 主食：小米面、小麦面、玉米面、高粱面等。
2. 肉类：牛、羊、猪、鹿、鱼、鸡、鸭等。
3. 菜类：白菜、豆角、同蒿、西葫芦、茄子、冬瓜、黄瓜、葱、韭、蒜等。
4. 水果：葡萄、桃、梨、瓜、枣、杏、栗、榛、海棠、柿子等。

（二）服装

大褂、马褂、袄、裙、袍、带、小衣、膝裤、红缨帽等；所用布料有：布、缎、绸、纱、罗、绢、锦、呢等。

（三）民间艺术

京剧、评剧、曲剧、杂技、相声等。

（四）手工艺品

景泰蓝、雕漆、玉器、内画壶、绢花、北京织毯、京绣、挑补花、琉璃、风筝。

（五）语言

“京腔”是我国北方方言体系中的标准语。

（六）社会组织

行业协会、外埠会馆及具有民间宗教色彩的地方性帮会组织。

本章补充说明

如前所述，对北京四合院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元代北京四合院，明清北京四合院，近代北京四合院，当代北京四合院。我们之所以这样划分是由于，首先，这四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重大的不同。其次，在这四个时期里北京四合院的情况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阶段的划分，实质上勾勒出了北京四合院的发展简史。

考察四个时期的北京四合院，以明清时期延续时间最长，型制最为规范，目前北京旧城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是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由于篇幅所限，在本书中，我们把重点放在对明清北京四合院的研究上，当代北京四合院则主要从评析及保护的角度加以阐述，而对元代北京四合院和近代北京四合院，我们不再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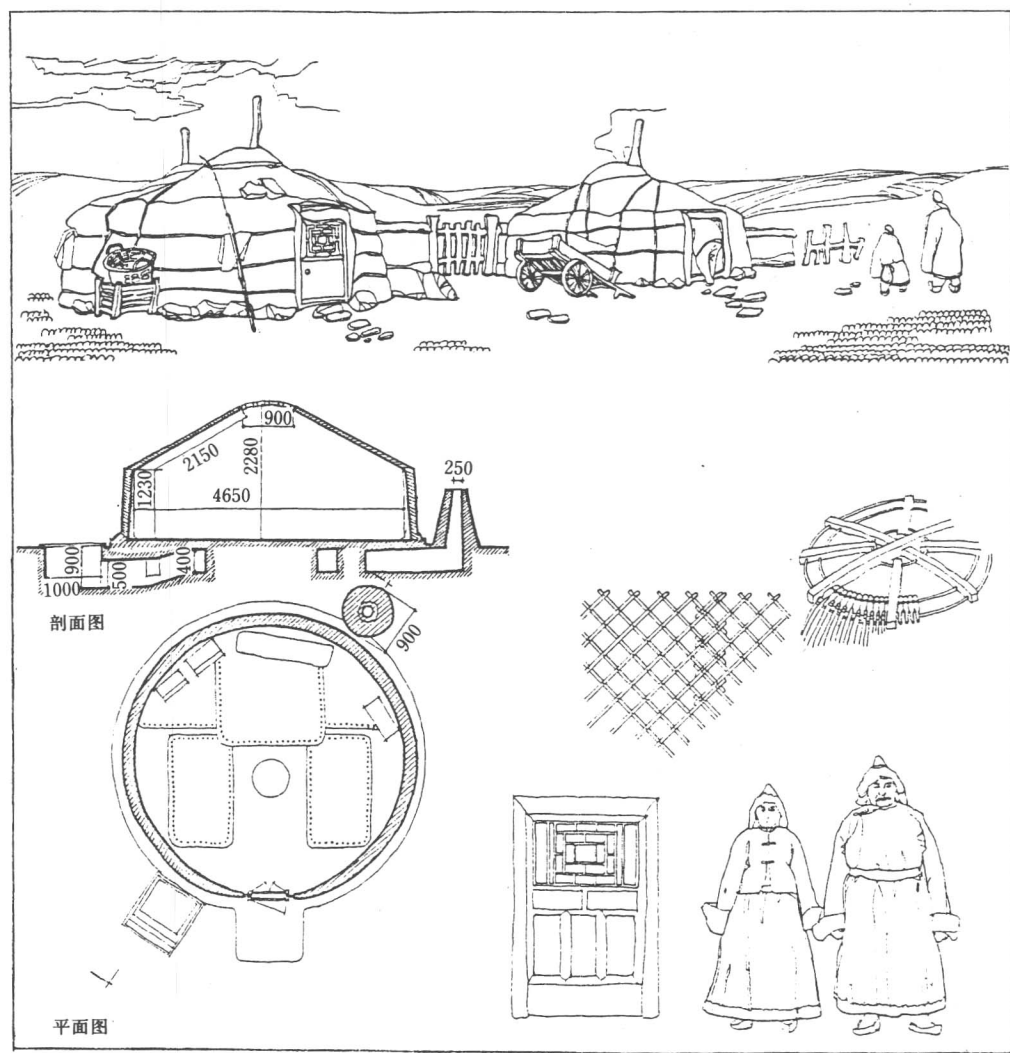


图 1-1 蒙古人居住的蒙古包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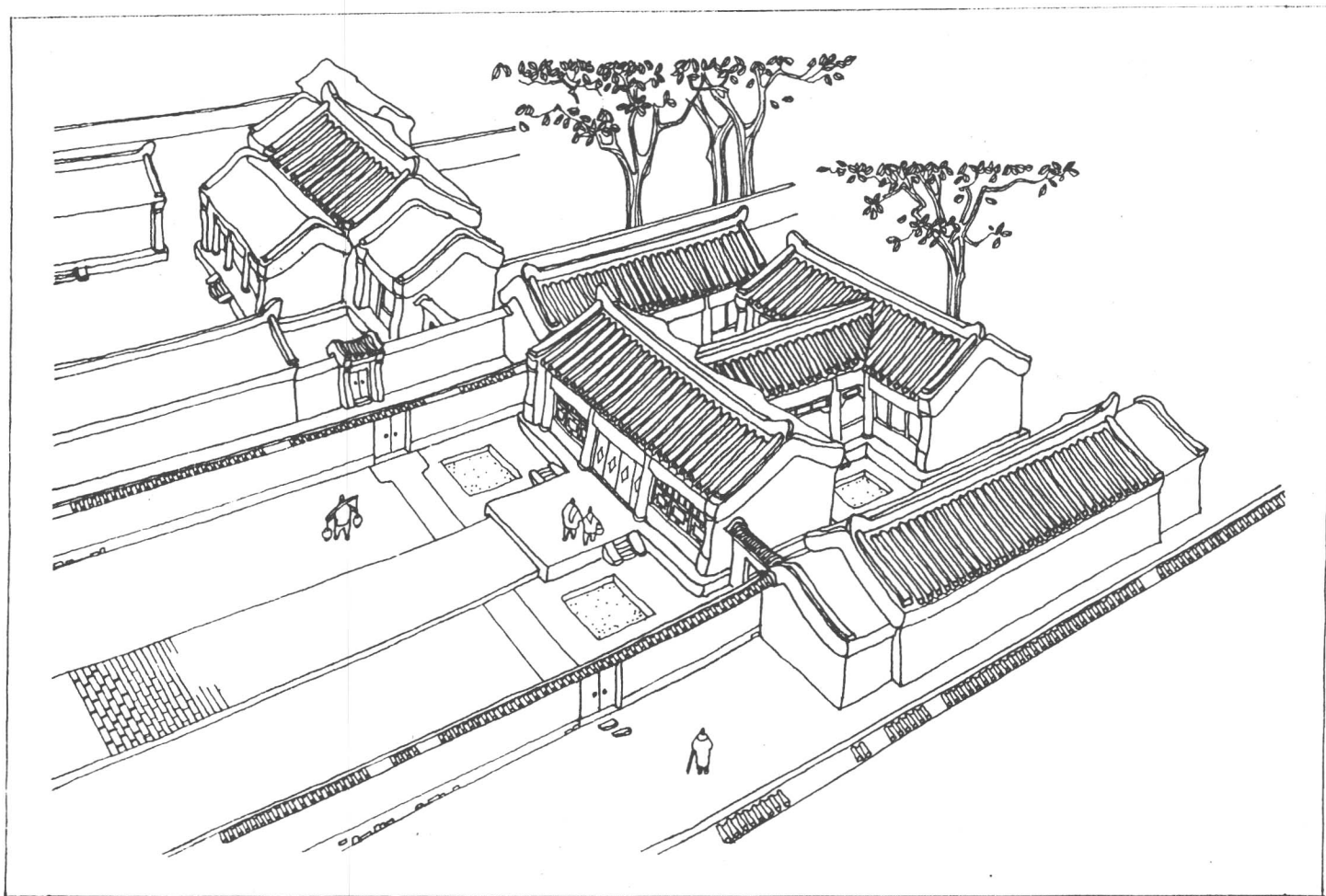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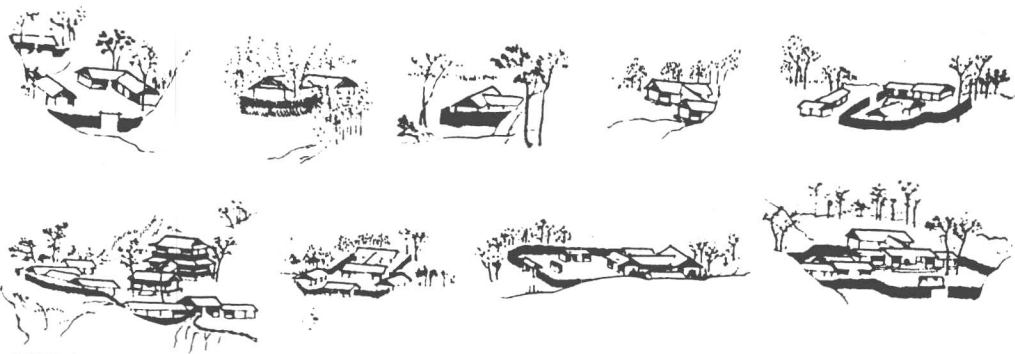


图 1-2 元代北京后英房四合院



小型住宅



中型住宅



大型住宅



村落

图 1-3 宋代《千里江山图卷》中的住宅

图 1-4 《清明上河图》中的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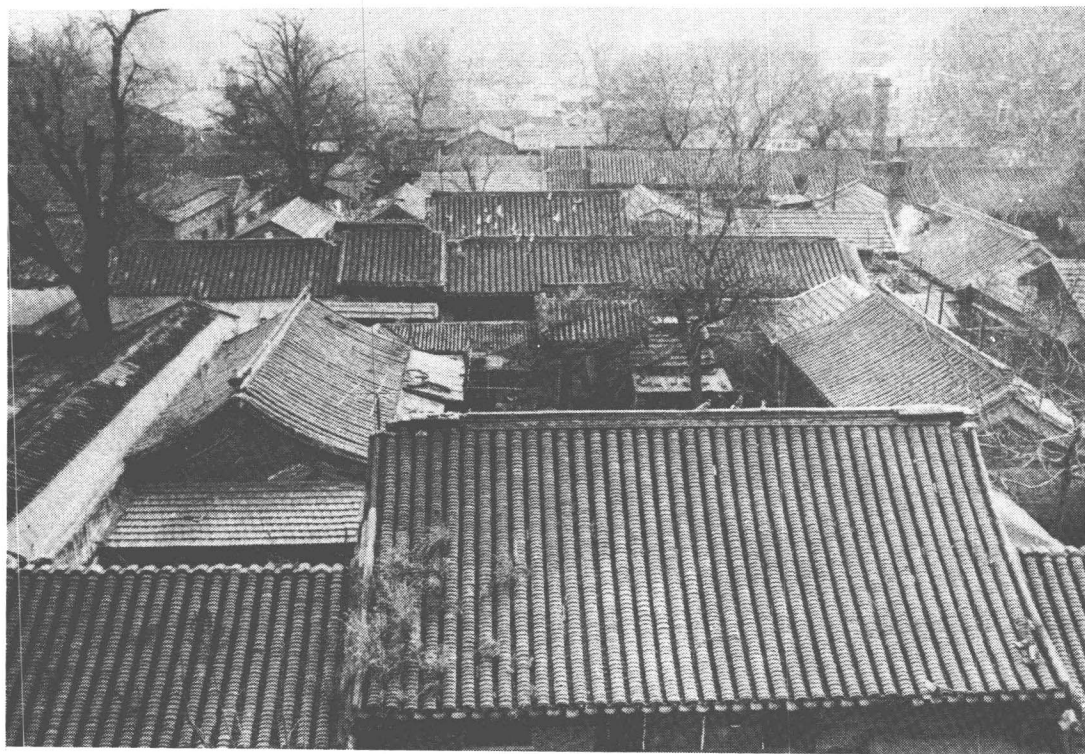


图 1-5 明清北京四合院



图 1-6 西西北六条清代四合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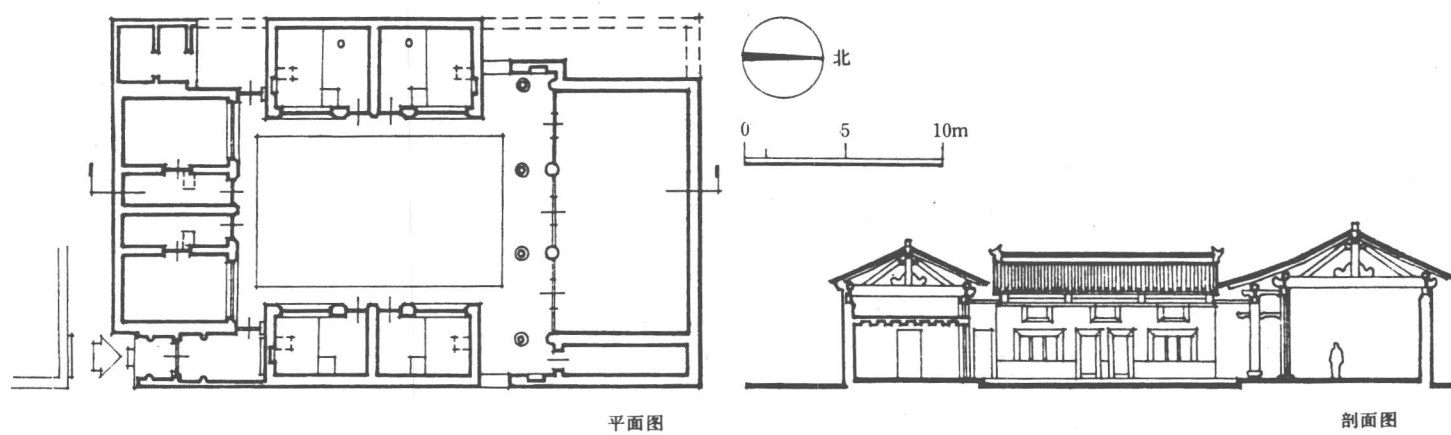


图 1-7 山西襄汾丁村明代住宅